

上海城市社会变迁丛书

清末劝学所研究 ——以宝山县为中心

高俊著



QINGMOQUANXUESUOYANJIU
YIBAOSHANXIAN
WEIZHONGXIN

上海辞书出版社

014012794

G527.51
03

上海城市社会变迁丛书

清末劝学所研究 ——以宝山县为中心

高俊著



QINGMOQUANXUESUOYANJIU
YIBAOSHANXIAN
WEIZHONGXIN

上海辞书出版社



北航

C1699667

G527.51
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末劝学所研究:以宝山县为中心/高俊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8

(上海城市社会变迁丛书)

ISBN 978-7-5326-4013-3

I. ①清… II. ①高… III. ①地方教育-教育史-研究-宝山县-清后期 IV. ①G527.5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9131 号

本书获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资助

责任编辑 刘 琼

封面设计 姜 明

上海城市社会变迁丛书

清末劝学所研究——以宝山县为中心

高 俊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18.5 插页 1 字数 248 000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4013-3/K·927

定价:45.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62431119

总 序

熊月之

上海近代历史,有一个特点,我们对其拥有的资料越是繁富,思考得越是深沉与持久,它在我们心中唤起的惊奇和兴味就越是历久而弥新,这就是笔墨难摹的复杂性。

这里有三类市政机关,三个司法体系,四种司法机构(领事法庭、领事公堂、会审公廨与中国法庭),三个警察系统,三个公交系统,三个供水系统,三个供电系统,电压有两种,法租界是 115 伏,公共租界是 220 伏,有轨电车的路轨宽度也分两种。

假如有人想从南京路乘电车去中国城里的某个地方,他必须先乘英国电车到租界边的爱德华七世大街(今延安东路),接着穿过马路进入法租界,乘法国电车到南头,然后穿过民国路,再乘中国电车继续前行。在这趟半个多小时的路途上,首先可看到的是穿着英国警察制服的英国人、白俄人和印度锡克族人,然后是穿着法国警察制服的法国人、白俄人和越南人,最后是中国警察。^[1]

这里人口多元。国内人口八成以上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湖南、山东等 18 个省区。同乡会是他们最熟悉的组织,同乡是他们最亲切的关系,名目繁多的会馆、公所,为同乡寻

找工作、排解纠纷、申诉冤屈,安排子女就学、看病就医,办理婚丧嫁娶之事,发挥重要作用。千姿百态的地方话、地方菜、地方戏,成为各路同乡认同的重要标志。外侨人口最多时超过 15 万,所属国籍与民族最多时超过 60 个,包括英、美、法、德、日、俄、犹太等。各种总会是他们最重要的社交场所,包括以英国人为主的上海总会、美国总会、法国总会、德国总会。日本人则自成社区,讲日本话,住日式房屋,吃日本料理,建日本神社,办日本学校,出日文报纸,将虹口地区建成了“小东京”。

这里货币多元。外国银行由于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获得在中国发行货币的权利。几乎所有重要的列强都在上海设有银行,发行过货币,确切可计的有 18 家,其中英国 4 家,美国 3 家,日本 2 家,法、德、荷、比各 1 家,还有 5 家是合资银行。它们发行的各种面值、各种文字、各种颜色、各种图案的纸币,英国女王头像、孙中山头像、自由女神像、赵公元帅像,同时出现在上海货币市场上,光怪陆离,莫此为甚。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城市,哪怕是伦敦、纽约那样的国际性金融中心城市,能够像这里有那么多品种的货币流通!

这里教育多元。除了国人官办或民办的学校之外,有教会办的,租界工部局、公董局办的,外侨团体办的,有在美国注册、用英语教学和考试的,如圣约翰大学,也有用法语、俄语、德语、日语教学的,学制、教员、教科书、教学方法、毕业文凭五花八门。

这里宗教多元。宗教门类之多,教务之盛,信徒之众,均为全国其他城市所罕见。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等五大宗教在这里都相当繁盛。这些信仰系统来源各异、形成历史长短不一、信奉对象千差万别、教堂样式千姿百态、礼拜仪式形形色色、节日庆典斑驳陆离的宗教,如果散布在世界各地,每个地方都自成一风景线,一旦汇集到一个城市,那就是众神毕至、群仙咸集、各显神通、

各呈异彩的名副其实的宗教博览会。

人口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必然带来节假日多元、风俗多元。一些多民族人混处的机关、团体、学校，为了照顾各自的宗教信仰，放假的节日就特别多。比如，圣约翰大学就中西节日兼顾，在春节、端午、中秋节要放假，在受难节、复活节、升天节、感恩节、圣诞节也要放假。

至于语言多元、报刊多元、饮食多元、服饰多元、建筑样式多元、娱乐方式多元，早已为人们所习知，毋庸赘言。

这些多元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近代上海处于中外两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处于多种文化影响的复合区域。

这里处于中国权力控制的边缘地带。租界虽是中国土地，但受治外法权保护，中国地方政府不仅不能管辖作为上海城市主体的租界里的外国人，连对租界里的华人也没有充分的管辖权，不能随意征税，不能随意拘捕，不能随意审判。

这里也处于英、美、法等国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公共租界虽然在大部分时间里权力主要控制在英国人手里，但是，它不等于香港或新加坡，工部局总董不等于香港总督。工部局总董由租界有关居民选举产生，并不需要向英国政府或英国驻沪领事负责，也不一定总要听从英国领事的意见。法租界的情况有别于公共租界，但法租界与法国政府的关系并不是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

这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如果仅出现在一个租界与华界之间，那还比较简单，而出现在两个租界并存、三个政权同在的情况下，就更为特殊，对于英国、法国、中国等权力控制系统来说，也更为边缘。俗话说：“天高皇帝远”，上海租界距离英国、法国、中国权力控制中心都特别遥远。

这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如果出现在政治体制相近、司法理念相

近、价值观念相同的情况下,那还比较简单,其间的差异会较多地体现为利益的不同、立场的不同。但事实是,英华、法华之间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方面既大异其趣,英法之间又曾为宿敌,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方面也有很大差异。这样,在华界与公共租界、华界与法租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间,事实上存在三道行政控制的缝隙,整个上海便成为全世界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异质文化交织的特有区域。

近代上海城市的这种复杂性,复杂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以至于后来的研究者对其作任何简单的概括、断语都是一种冒险,都可能失之偏颇。你可以说它是黑色的染缸,我可以说它是红色的摇篮;你可以说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我可以说它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本营;你可以说它摩登,我可以说它传统;你可以列出一百条理由说它是罪恶之渊薮,我也可以列出一百条理由说它是文明之窗口。红与黑、善与恶、美与丑、进步与反动、世界性与地方性……几乎任何两极对立的判断,对上海来说都能成立。只有一种判断不会招致反驳,这就是:极其复杂。

近代上海城市的这种复杂性,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这首先表现在她的文化交流功能。近代上海很像一个袖珍地球,全世界不同民族文化,英、美、德、法、俄、日、以色列、印度……全中国不同地域文化,南起香山、潮州,北到齐鲁、幽燕,东起江浙,西迄川湘,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民俗,都到这里来一展风采,互相交流、融合。说她像一个袖珍地球,而不是世界文化博览会,因为很多外侨是这里的居民,而不是过客。居民与过客不同,居民有长久性,有认同感,长期居住在上海的英美人自称 Shanghaiander,直译就是上海人,过客则呈临时性,无认同感。因为是居民,所以,他们

引进电灯、电话、自来水、抽水马桶,首先是自己欣赏,满足自用,而不是为了炫耀、兜售。其结果也有宣传作用,但这种宣传不是灌输式宣传,而是示范式宣传。灌输式宣传是我说你听,俯视式的,示范式宣传则是我做你看,平视式的,后者更能让受众心悦诚服,自觉接受。

这也表现在她的唯一性。放眼世界,盱衡古今,从古希腊到新大陆,从亚细亚到欧罗巴,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成千上万,有哪个城市会如此复杂?绝对没有。纽约、洛杉矶、巴黎等,也都是多民族移民城市,也都是多元文化,异质文化交织,但是,它们都不是行政机构多元、司法系统多元、交通系统多元、货币多元,在异质性程度方面,都远远不能与近代上海相比。

这还表现在她的不可复制性。道理很简单,近代上海之所以会出现一市三治,出现如上所述的那么多的多元,是以中国政府丧失对租界的行政管辖权、司法权、教育权等为前提的,是以不平等条约为后盾的,任何一个独立国家都不会以丧失对一部分领土的主权来进行这种复制。

这种不可复制性还在于,它的形成过程也不可复制。租界作为“国中之国”,并不是某个人、某个国家主观设计出来的,具有不可逆料性。治外法权是租界产生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西方列强在中国共设有 26 个租界,在许多城市享有治外法权,但没有哪个租界、哪个城市出现像上海这样复杂的情况。如果没有小刀会起义、没有道台权力失控、没有华洋混处,上海租界的形态就不会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那个样子,而小刀会起义、道台权力失控、华洋混处局面出现,都是彼时彼地、国际与国内、中央与地方、内政与外交、政府与人民、现实与历史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

20 世纪 30 年代,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北京大学教授曾觉之,从不同文化的并存、融合和新文化产生的角度,对上海现象进行分析,认

为上海将成为人类新文明的中心之一：

人常讥上海是四不像，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无所可而又无所不可的怪物，这正是将来文明的特征。将来文明要混合一切而成，在其混合的过程中，当然表现无可名言的离奇现象。但一经陶炼，至成熟纯净之候，人们要惊叹其无边彩耀了。〔2〕

所谓的“四不像”，所谓的“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无所可而又无所不可”，就是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就是异质文化和谐相处。

研究如此复杂的城市生活，从多时段、多角度、多侧面切入比较理想。为此，本丛书在卷目设计方面，既有以空间为维度展开的，也有以职业、阶层为维度展开的，还有以国别、民族为维度展开的。各卷关注点以广义的社会生活为主，包括人们的居住、饮食、衣饰、交通、娱乐、交往、婚姻、家庭、风俗、习惯、工作环境、工作特点、收入、消费等方面，兼及其政治态度、精神生活。

本丛书以研究近代上海为主，兼及古代、当代上海。古代上海是近代上海变迁的基础，当代上海是近代上海的延伸。1949年以后的上海城市生活，其变迁起伏，与整个中国城市生活变迁起伏的曲线基本一致，影响城市生活变迁的函数，时代因素重于区域因素，但是，上海仍然有其自身特点，有其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精神。这是本丛书将古代、近代、当代连通起来进行研究的原因。

历史研究需要关注宏大叙事，也需要关注日常生活。如果能够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在关注宏大叙事时兼及日常生活，在关注日常生活背后有宏大叙事意义，则更为理想。本丛书汇集这么多学者花这么大精力集中研究上海城市生活，除了上面所述的学术因素，即上海城市生活的极端复杂性强烈地刺激了我们的研究兴趣，我们还有

一个奢望,就是通过这项研究的展开,试图探究一下彼此悬殊的异质文化,在相对平静的状态下,是如何相遇、共处、交流、融合的。这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是一个全人类已经面临、无数学者正在关注的重大问题。

这是因为,历史行进到信息时代,波音飞机、高速列车,极大地提升了人类个体流动的速度,手机、因特网,极大地加快了人类信息传播的速度,古人所臆想的千里眼、顺风耳、飞毛腿也都已成为现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员交流、信息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便捷,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之间的理解、尊重、共存,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重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在全世界引起那么大的反应,与其说是源于人们对文明冲突的担忧,还不如说是源于人们对文明对话、文明和谐的冀盼。历史是现实的老师,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总爱向历史请教,从历史中汲取养分。于是,异质文化解读史、异质文化交流史受到学界的空前重视。在这方面,近代上海是难得的个案。以近代上海与今之世界相比,同构、相似之处极多。近代上海实为一小世界,今之世界实为一大上海。

本丛书总的框架、卷目由我设计,各卷内容由作者独立完成,我既不参与其章节设计,也不负统稿之责。

本丛书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各卷作者多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专业研究人员,也有复旦大学等其他单位的学者。多年来,课题组成员先后承担过“上海通史”、“上海大辞典”、“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上海外国文化地图”与“外语文献中的上海”等多项国家与上海市课题,多次参加国际、国内各种类型的研讨会,对所研究对象以及中间成果进行交流、讨论,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本丛书是课题组成员多年来集体攻关的智慧结晶。此

前,我们已经出版了一套《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凡 25 种,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这套《上海城市社会变迁丛书》,风格、体例一如前书,唯涵盖范围更广,社会期待更高,出版要求更高,我们也只有更加尽心,以为回报。

2013 年 6 月 12 日

注 释

[1] 石海山等著,朱荣发译:《挪威人在上海 150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0 页。

[2] 新中华杂志社:《上海的将来》,第六六条,中华书局 1934 年出版。

引言

1907年4月14日，清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初二日，山西太谷。一位塾师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武肄三充太谷北乡劝学员，所劝大村小庄设立学堂，蒙童从事于科学，欲将一切舌耕者置于闲散，不得藉以谋生。现在太谷一邑，蒙师多不能安其业也，有因设立学堂而废旧日蒙馆者已数村矣。天实为之，谓之何哉！”这位塾师名叫刘大鹏，光绪甲午年举人，从1894年开始，他在山西太谷县南席村一票号商人的家塾中任塾师近二十年。这篇日记撰写的时间正是本书所关注的劝学所制度在各地推广之时，日记中提到的武肄三是当时太谷县劝学所的一名劝学员。

刘大鹏日记中流露出的悲怆，可能会让人对劝学所制度产生一种不好的观感，然而，它却是清末新政改革中较为成功的一项举措。从1906年学部明令推行，到1909年学部进行第一次教育统计时，全国已有五分之四的州县创设了劝学所，这与清末新政改革中所常见的种种拖沓延宕形成鲜明对比。一个新生事物，除了外在因素的加持，短短数年即能获得如此迅速地推广，不能不认为其自身也是顺应了形势需要，其兴故勃焉。

在今天看来比较不容易理解的一个现象是，作为中央政府明令

创建的一种制度,其指导章程却并不统一,光是学部自己就先后出台过两部《劝学所章程》,其他地方劝学所的章程更是多不胜数,几乎所有劝学所都制定了本所章程或是办事细则。实际上,不光是劝学所,学部稍后推出的用以辅佐劝学所行政的地方教育会,也在各地有不同的条例条规。这些条章尽管大体上能遵守部章,但在具体的运作方面往往可见明显的地方特征。这一现象也反映出当时地域性差异的显著。如果不考虑这一因素,就很难理解为何在开展相同内容的学务工作时,不同劝学所采取的措施也不尽相同,对某处劝学所经验的总结,放到别处也许不太适合,有时甚至会难以“自圆其说”。因此,对清末劝学所制度的研究,有必要结合地域性因素进行,相同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及乡土民情,一般而言不会相去太远,总会具有若干共性。

本书作为上海城市社会变迁丛书中的一卷,所关注的地域自然以上海地区为主,书中对上海地区的定义包括今天属于上海行政区划的各个区县,清末原属于江苏省管辖的宝山县、上海县、嘉定县、南汇县、金山县、奉贤县及川沙抚民厅等,都在本书的考察范围之内。

清末上海地区各厅县中,若以教育成就而言,上海县无疑为执牛耳者。据学者统计,清末上海以一县之地设有普通小学堂 241 所,远远超过了部章关于兴学初期初等小学堂至少大县设 3 所、小县设 2 所、大镇设 1 所的规定,而在校学生人数更是冠于全国。^[1]这一成绩不只让一些教育水平不够发达的地方望尘莫及,即便是新教育起步较早的州县也相形见绌。但是,考察清末上海地区的教育经验,上海县却并不具备广泛的代表性。众所周知,上海县地接法租界、公共租界,晚清以来,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汇聚上海,在上海县创设学堂者除本地人士外,外国传教士、医生、洋商买办等,所在多有。上海县的教育经验掺入了过多的外来元素。

清末上海地区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宝山、川沙、嘉定、南汇、松江等地新式教育的起步也较其他地方为早。由于地利因素,新政时期,许多新知识分子及留日学生盘桓于此,与李平书、袁希涛、袁希洛、黄炎培、钱淦、顾忠宣等热衷教育及自治运动的本地人士联络密切。其中,袁氏兄弟长年致力于家乡宝山县的地方建设,袁希涛创设了宝山县第一个学务机构学务公所,后于民国初年出任教育部次长及代理总长。袁希洛发起成立宝山县第一个教育会组织,其本人也是同盟会元老,辛亥革命后曾作为江苏省代表,参与推选临时大总统,并在后来孙中山就职仪式上代表国民为其授印。由于地方绅士的积极参与,宝山县初等教育的推广颇有成效,当年的小学堂中走出了潘光旦等一批本地俊彦。长期从事晚清社会史研究的杨立强教授对于宝山县与上海县的关系有过非常精辟的总结:“上海县创立了什么机构、团体,举办了什么活动,宝山县也设立相应的机构、团体,开展相应的活动,有一些甚至名称都一样。上海县行动在前,宝山县蹒跚于后。”^[2]

本书有关清末劝学所的论述,主要围绕上海地区展开,其中又以宝山县劝学所为中心。书中所引用资料,主要来自宝山县劝学所编纂的《宝山县劝学所光绪三十三年学事一览》(上海公益印刷厂 1908 年印制)、《宝山县劝学所辛亥学事一览》(上海光华印刷所 1912 年印行),该资料集的主要编写者王钟琦、吴邦珍、徐之桢、龚炽昌等人,均为宝山县劝学所成员,王钟琦、吴邦珍先后担任过宝山县视学兼该县劝学所总董。此外,宝山地方绅士编纂的《宝山县志》、《宝山县续志》、《宝山县再续志》、《宝山共和杂志》等, also 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书中关于私塾改良的论述则主要比照京师劝学所展开,这是因为在劝学所初创之时,改良私塾是学务工作的重中之重,学部为树立榜样,特设京师劝学所“以为各省之表率”。

清末劝学所制度推行于科举制废除之后,在这一制度的参与者及见证者中间,由于地域及文化背景等方面的不同,对劝学所感受复杂。上海地区由于得风气之先,新式教育起步较早,劝学所主导的学务活动遭遇阻力相对较小,杨斯盛毁家兴学的义举在当时已被广为传颂。而其他地方,像刘大鹏这样屡遭科场挫折而对科举犹眷恋难舍者也不在少数,他们对劝学所的成见或抵触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在转型期社会中,任何个人立场都难免随形势调适,刘大鹏从一个授业二十余年的塾师转变为一所新式小学的校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注 释

[1] 施扣柱:《清末上海教育改革之研究》,载《上海研究论丛》第7辑,第182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2] 杨立强:《清末民初资产阶级与社会变动》,第17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目 录

总序	1
引言	1
第一章 劝学所的缘起	1
一、新政改革对初等教育的重视	2
二、省级学务机构的建成	6
三、直隶经验与劝学所创设	13
第二章 劝学所制度在全国的推广	22
一、职员设置及学区划分	22
二、劝学经费	40
第三章 督办地方学务:改良私塾	59
一、改良团体的组建	59
二、改良步骤	64
三、师范传习所	81
第四章 督办地方学务:整治和规范学堂	94
一、学堂普查	94

二、课程表·教科书·教授法	111
三、兵式体操与学堂乐歌	141
 第五章 推广社会教育	157
一、半日学校	159
二、阅报及宣讲活动	172
 第六章 地方教育行政体制的确立	193
一、劝学所与教育会之关系	193
二、改定劝学所章程	204
 余论	213
附录1 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光绪三十二年四月)	216
附录2 宝山县劝学所章程	220
附录3 辛亥视学日记	223
参考文献	274
后记	279